

孔 子

杨书案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6插页 270 000字

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 000

ISBN 7—5354—0356—5

I·307 定价：4.90(平)元

ISBN 7—5354—0357—3

I·308 定价：7.20(精)元



杨书震男，汉族，湖南宜章人，中国共产党党员。1935年中秋生，1950年冬参加军事干校，1956年秋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，1958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，1960年大学毕业。历任教师、文化馆创作干部、编辑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副主席，武汉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武汉市文学创作所所长。

1957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开始发表作品。主要著作有长篇历史小说《九月菊》、《风流武侯娘》、《儿曹识干戈》，及儿童文学集《小兵和小猴》、《智慧老人和记忆口袋》、《蚂蚁》、《地下室奇闻》、《狂蛇之死》等。

《隋炀帝通事》获全国报纸连载小说奖，《小兵和小猴》获全国第二届少儿文艺创作奖，《蚂蚁》获中国新时期优秀少儿文艺创作奖。另有长篇作品在全国报刊及省市儿童文学杂志。

孔
子
讲
易
辞



仲尼聆仙乐



南子摸眉



孔丘理诗



内 容 提 要

全世界几乎都知道孔子这个名字！

日本井上靖先生因著《孔子》而获奖！

再作《孔子》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

但摆在你面前的这部《孔子》，能给你一个怎样的印象呢？

直率地讲，如果井上靖先生的《孔子》是一部富有哲理意义，又有艺术价值的“大书”，让你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，那么这部《孔子》将使你经历一次历史的巡礼，得到一次艺术的享受，让你看见一个活生生的孔子。

杨书案，这位在历史题材的田野里辛勤耕耘的小说家，《孔子》可以说是他的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小结，也是一个新的起点。他把自己全部的历史经验和艺术技巧都倾注在这部作品中，从而使《孔子》富有深厚的历史感和浓郁的文化氛围，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理性内涵。

这是一部既雅又俗、大雅大俗的作品。可能比井上靖的《孔子》更有魅力。如“子见南子”这样男女间的事，井上靖先生没有提及，而作家杨书案在他的作品中描写了诸如此类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。倘若好奇，请你读读这部中国自己的作家写的“大书”吧！

孔子：从精神偶像到艺术典型

(序)

缪俊杰

杨书案的长篇历史小说《孔子》，我是怀着极大的兴趣，很快拜读完的。这部二十多万字的新著，使我仿佛经历了一次历史的巡礼，也得到了艺术的享受。我觉得应该写点什么，告慰我这位在历史题材的田野里辛勤耕耘的朋友。

孔子，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和政治家，他的影响已经不限于中国，而已遍及世界；他留下的精神财富，不仅属于中华民族，而应该为全人类所共享。1989年10月，在儒学的发源地中国的首都和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，举行了孔子诞辰254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，来自世界五大洲2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学者，共聚一堂，纪念这位已经逝世两千多年的思想家，足见他的影响的悠远和广泛。两千多年来，对孔子的研究和评价，对他的膜拜和不敬，人们写下的文章，已经很难用“车载斗量”来形容了。孔子，作为一个“精

神偶像”，已经牢固地树立在不同时代、不同文化水准和年龄层次的人们的心目中。我敢说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没有任何一位思想家在炎黄子孙中有如此巨大的影响，也没有任何一位中国思想家超越时空界限，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得到承认。如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衡量，孔子的思想当然存在许多缺陷，有着严重的时代局限性，对社会的发展也有许多消极的影响，但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之一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。

孔子的形象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文学艺术作品，我没有作详细的考证。孔子逝世不久，鲁哀公给他写的诔文中称他为“尼父”，表示了对他的尊敬；过了三百年，汉高祖刘邦过鲁，用“太牢”（祭天的大礼）祭孔子；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；汉元帝将孔子封为“褒成宣尼公”。到了封建社会鼎盛时期，唐玄宗开元27年把孔子封为“文宣王”；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又封为“至圣文宣王”；元成宗大德11年，把孔子封为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。他的画像遍布在各种庙堂殿内。孔庙圣迹殿，是孔子画像的世界。正面墙上100多幅刻有孔子画像、记载着孔子一生事迹的明刻《圣迹图》，其中有相传为晋人顾恺之手绘的“孔子为鲁司寇像”，以及“子行颜随像”、“孔子燕居像”、“孔子行教像”。这些石刻画像，有帝王化了的形象；有的则是呈现出他作为慈祥的老者，高雅的文人，渊博的学者的形象。目前国内外孔子像约有几十种，包括画像、印制、刻石和雕塑几种类型。此外，戏曲中也出现过孔子，到了近年，更有《布衣孔子》，孔老夫子出现在戏剧舞台上。在文学创作中，除了诗词中的描写外，用小说形式描写孔子，最有影响的应该首推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的长篇小说《孔子》。

井上靖先生是日本的著名的小说家，他的历史小说蜚声文坛，尤其是《天平之甍》、《楼兰》、《苍狼》、《敦煌》等以中国古代历史为题材的小说，展现了中国远古文化多姿的历史长卷，抒发了他对中国文化艺术的深厚感情，把人们带回到远古遐想中去，感受到文明古国的神韵。他的长篇新作《孔子》，表现出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解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。这部小说成为日本的畅销书，获得“野间文艺奖”，不少国家翻译出版。他七十岁开始读《论语》，获得创作这部小说的灵感，到八十岁完成作品，八年间六次到山东、河南实地考察，其中两次走进鲁都曲阜，四次踏入河南中原，甚至为搞清一个地名，特地到信阳郊外，探寻叶公问政于孔子的城镇负函，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。他以巨大的魄力，超越二千五百多年的时空，用沉默而透彻的眼睛，力图把人类文明史初期的思想结晶化为“通向二十一世纪的希望之书。”书中通过虚构人物蔦姜的叙说，表现了作者对人生、命运、历史、社会的沧桑巨变的心灵的呼喊，他企图在孔子和儒家的巨大思想文化宝库中寻觅一种透明的纯洁，把人类从痛苦、不幸、矛盾、灾难的相克中拯救出来。他把孔子作为一个“人”来描写。为了写人物，才借来“历史”这个场景，又借人物来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。表现心灵深处奔腾着的巨大的历史长河。毫无疑问，井上靖的《孔子》是富有哲理意义，又有艺术价值的一部“大书”。我读了这部杰出的作品，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。但沉静下来，一经反思，顿时又醒悟：这毕竟是外国人写的书。孔子出在中国，为什么没有中国人写的塑造孔子形象的书呢？正在这时，我收到了杨书案寄来的他的长篇小说《孔子》书稿，真是喜出望外。

在享有国际声誉的大手笔井上靖的《孔子》之后，杨书案的《孔子》将会有什么反响呢？目前还难以预测。但在读过杨书案的《孔子》书稿之后，我至少得出这样的印象，杨书案笔下的孔子，是表现中国古代文化氛围和文化心理，充满中国的社会风情和生活色彩的艺术典型，同井上靖笔下的孔子是完全不同的，是杨书案塑造的“这一个”孔子。

二

杨书案作为一个历史小说家，长篇小说《孔子》，可以说是他的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小结，也是一个新的起点。他把自己全部的历史经验和艺术技巧都倾注在这部作品中，从而使《孔子》富有深厚的历史感和浓郁的文化氛围，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理性内涵。

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，杨书案经历了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。他是从童话创作起步的，但真正使他在文坛占有一席地位的是他的历史小说。1981年，他的第一部历史长篇小说《九月菊》问世。作品艺术地再现了唐末农民起义的悲壮历程，塑造了起义领袖黄巢的动人形象。1983年，他的第二部长篇《秦娥忆》出版，这是写秦始皇的，从秦始皇以武力吞并六国，结束长时期七雄纷争，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帝国，开拓“六王毕，四海一”、“车同轨，书同文”的宏恢气象，表现了风云变幻的一个时代。1984年，《长安恨》作为《九月菊》的续篇与读者见面，它描写了黄巢所率的起义军从鼎盛到败亡的过程，完成了黄巢这位义军领袖的悲剧性格。过了两年，即1986年，他的另一部长篇《半江瑟瑟半江红》问世，这是写隋炀帝大业年间的若干重要事件，从宫廷政变到强娶女妃，从修赵州桥到开凿大运河，表现了错综复杂的时代矛盾和隋炀

帝的复杂性格。这四部长篇之后，杨书案的创作，题材和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从金戈铁马转向宫帏秘事，于是就有了《风流武媚娘》和1988年版的《李后主浮生记》（又名《几曾识干戈》）。后者表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悲剧生涯。作品生动地描绘了李煜既是一位风流儒雅的帝王，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词人。从他被掳北上囚居汴梁，过着屈辱的俘虏生活到被赵光义毒死，充分地展示李煜的悲剧性格。毫无疑问，这些作品都为杨书案赢得了声誉，也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从历史小说的特殊创作规律来说，《孔子》同他以前的几部历史题材相比，创作上具有更大的难度。它的难度来自两个方面：一是孔子的“知名度”太大了，他的名字家喻户晓，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孔子的形象；二是孔子的历史太久远，关于他的生活的具体资料太少了。学者们可以根据一部《论语》去研究和阐述孔子的哲学思想、教育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，但作家仅仅根据《论语》来写小说就大大不够了。因为文学作品除了思想和主题之外，还需要丰富的故事和情节，才能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。

在长篇小说《孔子》中，我们看到了杨书案的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，作家把史书上的断简残篇和孔子的片言只语，化为有声有色的故事和生动感人的艺术情节。例如，关于孔子的出生问题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里记载“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”。究竟何谓“野合”，历代学者都有不同的理解，不同的解释，孔子的出身问题也因此而成了一桩历史的悬案。唐人司马贞在《史记索隐》中说：“野合者，盖谓梁纥老而征在少，非当壮室初笄之礼，故云野合，

谓不合礼仪。”杨书案在《孔子》里，描写梁纥与征在是一对老少夫妻，非仪礼而婚，非仪礼而育，很显然是根据司马贞的观点来铺排故事、虚构情节的。而非按照汉代学者郑玄在《礼记·檀弓》的注解中的观点，即所谓叔梁纥对颜氏之女征在施以强暴性行为而生孔子的。作为一部历史小说，作者是可以一定的历史大背景下，对具体的细节作符合艺术规律以虚构的。我觉得作者对孔子出生所虚构的细节，是合理的，是有利于展现人物的性格的。

作者在对孔子这个人物的把握上，避免了过去对孔子的所谓“阶级分析”所得出的结论，而是从研究具体历史环境出发，把孔子作为活生生的人，由此而把握孔子的性格。从“五四运动”的“打倒孔家店”到十年“文革”中的“批林批孔”，孔子是一个定了型的人物，即认定孔子一生尊崇周王，礼敬鲁君，从政治国都是维护当权者的利益，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；或认为孔子的言行有利于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，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。两者结论虽然不同，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一致的，即比较简单地采用了阶级分析方法。在文学创作上如果简单地在孔子身上贴上阶级的标签，人物塑造很可能是脸谱化的。杨书案没有采取贴标签的方法，而是在开掘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方面下力气，把孔子置于春秋战国后期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传统文化氛围之中，表现出孔子的社会理想和文化心理。

杨书案的历史小说涵盖着浓重的悲剧意识，比较充分地表现了悲剧的历史氛围。他的几部长篇历史小说，几乎都是如此，在这部新作《孔子》中，也包含着悲剧的色彩。孔子智慧过人，博学多才，是一个知书识礼的大知识分子，他在自

己的祖国鲁国，虽然做过几年“司寇”一类的小官，但却不见重于君王；他处处维护君王的利益，君王对他并无厚爱，没有得到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。好在当时不限制“人才流动”，所以孔子能兴办教育，带着一大帮学生“周游列国”，企图寻找施展才华的机会。但是出走异国，仍然命运不济。他先到了卫国，虽受到卫灵公的礼遇，却受到其夫人南子设下的圈套的侮辱；离开卫国想投奔晋国，不料在汾河边上险些被赵简子暗算；折回来投奔宋国，宋君不用他，不得不在馆舍的大树下讲学等待，不料又被宋国权臣砍倒大树把他赶出国门；后来又困在陈国和蔡国的边界上，一连七天没有饭吃，只得用野菜充饥。孔子不气馁，仍然采取乐观的态度，“弦歌不绝”。随同出游的学生子路和子贡困惑不解，便问孔子道：“我听说，为善的人天报以福，做坏事的人天降以祸，夫子一向积德行义怀美行，为什么总是受困穷呢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你把事情看得太绝对，想得太简单。有才智的人都能被任用吗？那么王子比干为什么被商纣王剖心而死呢？忠义的人都能见用吗？那介子推为什么抱木焚死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的多着呢！难道只我仲尼一人？贤与不肖素质不同，遇与不遇时机不同，生不逢时贤才无用武之地。姜太公八十才遇文王，当了周的军师！管仲囚于槛车，遇到齐桓公才为相。芷兰在深山之中，人不见也就不知道它的芬芳，所以君子好学，修身端行，以待其时。”孔子对子路、子贡说的这番话，包含着孔子对人生的理解，也透露出孔子的悲剧命运是时代使然。如果说井上靖先生的历史小说《孔子》中，书中虚构的人物蒧姜在深山寒村独居三十二年的孤独、与内心对话的岑寂正是作者对历史感情的浓缩、美学观念的抒发，那么，

在杨书案的历史小说《孔子》中的孔子的这段内心剖白，何尝又不包含着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和美学观念的阐发呢？作品的思想容量和历史深度，正是透过人物的具体形象折射出来，这也正是《孔子》的深刻的思想内涵的艺术显现。作品的力度也正在于此。

三

小说作为叙事性的一种文体，发展演进到某一阶段，已经不能满足于“讲故事”这个层次了。人物成了艺术表现的中心，小说家把自己的艺术视角和艺术重心放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，把塑造典型人物当作自己追求的美学目标。因此，人物性格塑造的成功与否，成了判断一部作品艺术价值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。

《孔子》塑造了包括孔子、子路、颜回、子贡、曾参、卫灵公、南子夫人、季桓子、阳虎、蘧伯玉等等，一系列人物形象，有些人物写得很有光彩，使人难以忘怀。

《孔子》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，当推主人公孔子。千百年来，孔子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尊“精神偶像”，孔子完全帝王化，甚至成了凡人不可企及的“神”。而长篇小说《孔子》里，作者则把他还原为一个“人”，一个活动在两千多年前的卓越的知识分子，一个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不息又屡遭失败的悲剧人物。作者循着某些历史资料所提供的线索，通过对孔子的思想命运多侧面、多角度的展示，把人物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的“人”。孔子出生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，父母“野合”（没有正式礼仪）而生他的个人命运，使他从小就形成了一种逆反的性格。他非礼而生，就使他很早就觉悟到“礼”的重要。他生活在“礼毁乐崩”的时代，就使他感到拯救礼乐的必要。

作者用许多生动的细节表现孔子特殊性格的形成过程。年岁稍长，他就意识到“男女大防”的重要，主动提出要同自己的母亲分开住。而这同当代某些小说中描写的所谓“性意识的觉醒”是不同的。他刚刚习武学射，就把射的鸟给母亲吃，以表现他的“孝”，母亲提出要他娶亲，他也唯母命而从之。他对周礼的崇敬到了顶礼膜拜、五体投地的地步。正是对古训、周礼的崇敬，在品德修养上的严格要求，打下了他以后从政治学的坚实基础。

孔子的悲剧命运应该说是从他从政以后开始的。他在鲁国做过几年小官，但这位博学多才、知书识礼的大知识分子却不见重于鲁国君王。他有一种落漠感，愤愤然从鲁国出走，以图见用于圣主明君。他为什么出走？因为他同鲁国的权臣季桓子等政见不同，“道不同，不相谋。”他的出走，固然是谋碗饭吃，但更主要的是找个好的环境行道，实现自己多年的抱负，以仁以德治国。但是到了卫国，事情并不顺利，卫灵公没有及时接见他，而却遇到了他不想见的女人南子。“子见南子”的故事在史书里并没有详细的记载，然而这竟然成了孔子品行上的一个污点。也许孔子本人也不会想到，二千五百多年以后，中国搞了个“批林批孔”，在“子见南子”的问题上大做文章，说孔老二“满口仁义道德，满肚男盗女娼”，企图覬覦一个有夫之妇。实在荒唐至极！《孔子》的作者或者无意，或者有心，通过孔子两次见南子的描写，还孔子以本来面目，或者说为孔子做辩证的翻案文章。

南子也是一个有血性有七情六欲的女子。她是宋国公室的女儿，嫁到卫国，做卫灵公的夫人，因为她来自南边的宋国，故取名为“南子”。由于她的美貌和能干，受到卫灵公的

宠爱。但是她的受宠却成了朝野攻击的对象。不顺心的事，使她怀念故乡，在感情的深潭里泛起了新的波澜。她成了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。孔子的到来，成了她挽回名誉的一个契机。有人给她出主意，说鲁国的仲尼先生一向不愿见品德名声不好的人，更不得见女子，如果让仲尼进宫拜见夫人，定能挽回影响。并且设计了诓孔子进宫的圈套。孔子如约进宫见了南子，不卑不亢，以礼相待，却引起了弟子们的非议。在子路责问的目光下，仲尼觉得有愧，又觉得委屈，于是对天起誓：“我并不是真心想去见她，实在出于不得已而去的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天惩罚我，天惩罚我！”这个细节把孔子性格中的矛盾和感情世界中的微妙变化，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。

如果说，孔子第一次见南子，在他心中引起的仅仅是某种不快的话，第二次见南子则使他感到受辱和愤怒了。仲尼进宫见南子，使她心里着实高兴了几夭，但南子的心病并没有从根本上去掉。“彼采萧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”。原来南子在宋国有自己的恋人，他就是宋国的贵公子朝。南子和公子朝虽然多年分离，但恋情不断。南子乘卫灵公的长子蒯聩出使邻国期间，想方设法以想见亲人为名，约公子朝到卫国幽会，由此更引起朝野的蜚短流长。南子又想到仲尼，再请孔子陪她在朝歌市上驱车走一遭，让国人看看当今世上品德最高、学识最渊博的孔丘如何看她，一切流言蜚语就会自然消失了。孔子果然中计，随卫灵公和南子同游朝歌。孔子这次讨了个没趣，还受到世人的非议，因而感到受辱，愤愤然收拾行装离开了卫国。孔子两次见南子的情节是虚构编造的，但却把孔子和南子的性格都作了有力的刻划，在作品中可算是精彩的一笔。